

“西方价值之所以可贵正在于它的独特性，而不在于它的普遍性”。<sup>1</sup>不难推断，从西方中心主义的时代的颠峰跌落下来，他心里是不会好过的。他为西方设计的战略只是严守北大西洋公约以自保，但是在铺天盖地而来的“黄祸、绿祸与黑货”面前，他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信心（这是一位亚洲朋友的话，绿祸指伊斯兰、黑祸指黑非洲，因此还不能把这样“政治上不正确”的“反PC”的话安在亨氏头上）。对于黑祸，在世界范围内，他的恐惧要小一些。这可能是因为黑非洲迄今为止还没有表现出强大的经济活力，因此在他的文明分类中，只是把“非洲文明”列为“可能有第八种文明”。他也有相当的“统一战线”意识，把日本文明单列而且与西方文明拉在一起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此外他极力想把拉美文明也拉做西方文明的同盟军，而且对俄罗斯也偶做拉拢之意。考虑到俄罗斯人既是白种人又是基督徒，这一意向不难理解；但是几十年的敌对，以及天主教与东正教上千年的分裂又使他顾虑重重。

亨廷顿的理论内在的悖论是十分明显的，人类自古以来的各大宗教，各大思想体系，都不但把自己的价值观看成是普世性的，而且都预设人性有统一的价值标准，近代的启蒙思想家和革命思想家（如马克思主义）也并不例外。亨廷顿鼓吹的“西方文明”比之于历史上的英国文明、德国文明、法国文明、西班牙文明…各种各样的特殊文明来已经可以说是一种范围相当广大的“普遍文明”了，如果对照他自己说的“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过是西方的内战”的话，矛盾尤其明显。为什么 50 年前还在打得你死我活的国家今天就已经可以统一在“西方文明”的旗帜下了呢？但是亨廷顿所说的“在可见的将来，不会有普世的文明”这话应当是可信的。人类的历史已经有几百万年，而文明的历史从苏美尔人算起还不过七千多年，即使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挫折以后也不敢相信再有几十年的时间就能实现世界大同。因此亨廷顿的下一句话，也就是第一篇《文明的冲突》的结语——“有的只是一个包含不同文明的世界，而其中每一种文明都得学习与其他文明共处”听起来有一点伪善的味道。

总而言之，亨廷顿的观点值得重视，因为它们代表着一种深刻的恐惧。正如我们上面所分析的，这种恐惧决不仅仅代表他一个人，而是代表着一大批人。大家知道，恐惧会产生仇恨，而仇恨又能孕育战争，而亨廷顿所设计自保方案竟还是已有半个世纪历史的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战争机器——拥有核弹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亨廷顿虽然声称冲突并不等于战争，然而他也不排除冲突可以是战争。“文明的冲突”是一种说着说着就会自动实现的带恶兆的语言（self-fulfilling expectation）。大家都知道，人类的生存空间几乎已经塞满了，甚至已经是过度拥挤了。布热津斯基曾经说 20 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丑恶的“大死亡的世纪”，同时他也不能排除 21 世纪不爆发同样的惨祸。我相信我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相信普世文明终会出现，但是几十年，一二百年对人类的文明史只不过是一瞬间。人类是否还要流血流泪再走过一段满不荆棘的道路才能通到开满玫瑰花的芳草地呢？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本文原载于《太平洋学报》1997 年第二期，经作者同意，特在本通讯发表）

## 【海外采撷】

# 美国国家利益受到忽视

（美）塞缪尔·亨廷顿

<sup>1</sup> Samuel H. Huntington: “The West Unique, Not Universal”,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1996.



文章说，今日美国日益混乱，主要在于失去了敌人，没有敌人即无法塑造国家认同。此外，他还将美国自己的问题都推给了外来移民，认为，多元化削弱了国家认同；他断言美国现在是、以后仍将是一个全球霸主，并宣称中国会成为美国的一个新敌人。

### 对国家特性认识不一

冷战结束以来的这些年，有过多次关于美国国家利益的激烈、广泛、混乱的辩论。造成混乱的主要原因是冷战后世界的复杂性。对这一新的环境的解释众说纷纭，如历史的终结、富国与穷国的两极对抗、向传统强权政治前景的回复、濒于无政府状态的民族冲突的扩散、文明的碰撞、一体化与分裂之间的对抗趋势。新世界是如此纷繁复杂，对美国在其间的利益自然难有定论。然而，这并非是造成混乱的唯一根源。要确定国家的利益，必须首先对这个国家的性质取得共识。国家利益取决于国家特性。必须首先知道我们是什么国家，方能知道我们的利益所在。

从历史来看，美国的特性有两个主要成分：文化与信念。第一种成分主要是指价值观和早先移民的习俗。这些移民是北欧人，主要来自英国，信奉基督教，绝大部分是新教徒。这种文化主要包括英语和有关教会与国家关系及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的传统。

美国特性的第二个成分是美国领导人在立国文件中所阐明的一系列普遍的主张与原则：自由、平等、民主宪政、经济自由主义、有限的政府、私人企业。

当然，构成美国特性的这两种成分是密切相关的。然而，现在冷战的结束与美国社会、文化和人口的变化使人对美国特性的这两个组成部分的正确性与作用产生了怀疑。由于对国家特性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美国人变得不能确定他们的国家利益，因此也不能确定从属于国家利益的商业利益，于是超过国家和非国家的民族利益便支配了外交政策。

### 失去了对手

美国在冷战后世界上扮演什么角色这一最深刻的问题，是由约翰·厄普代克小说中深受困扰的主人公拉比·昂斯特伦以奇特方式提出的：“没有了冷战，做一个美国人还有什么意义？”如果说做一个美国人意味着致力于自由、民主、个人主义和私有财产的原则，那么，若是没有一个邪恶的帝国威胁到这些原则，做一个美国人到底意味着什么？美国的国家利益又会怎样？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以反对苏联和世界共产主义的民主自由世界的领袖自居。在冷战期间，美国所追求的目标有很多，但是它压倒一切的国家目标是遏制并打败共产主义。当其他目标和利益与这一目标发生冲突时，它们通常都被置于从属地位。美国国内政策中的许多主动行动和对外政策中的许多主动行动和对外政策中的许多主动行动，如对希—土援助计划、马歇尔计划、北约、朝鲜战争、核武器和战略导弹、对外援助、情报活动、降低关税壁垒、空间计划、争取进步联盟、与日本和朝鲜的军事联盟、支持以色列、海外军事部署、前所未有的庞大军事机器、越南战争、对中国开放、支持阿富汗圣战者组织和其他反共叛乱，均是以这一目标为依据。如果没有冷战，诸如此类的重大计划和主动行动的理论根据也就不复存在。80年代末，当冷战渐近尾声时，戈尔巴乔夫的顾问格奥尔基·阿尔巴托夫宣称：“我们正在做真正令你们恐惧的事情——我们正在使你们失去一个敌人。”虽然战争有时可能会使社会分裂，但是，一个共同的敌人往往有助于增强人民之间的共识和凝聚力。

冷战加强了美国人民与政府之间的一种一致性。冷战的结束可能会削弱或至少使这种一致性



发生变化。由此可能带来的一个结果是对联邦政府的反对日益强烈，因为说到底，这个政府毕竟是美国国家特性与整体性在体制方面的一个主要表现形式。如果联邦政府仍然保护这个国家免受一种严重的外部威胁，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会不会去爆炸联邦大楼、袭击联邦执法官？过去，制造此类爆炸事件的通常都是以美国为敌的外国人，许多人对俄克拉荷马城爆炸事件的第一个反映就是认为这是一个“新敌”——穆斯林恐怖分子干的。这种看法可能反映了一种心理需要，即认为这样一种行动必然出自一个外部敌人之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爆炸事件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正是因为缺少这样一个敌人所致。一些学者已经指出，在某些方面和某些情况下，一个敌人的存在可能对群体的内聚力、士气和成就有积极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就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美国经济、技术和社会的进步。目前，由于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在全球广泛得到接受，美国缺少一个它能令人信服地抗衡的国家或威胁。萨达姆·侯塞因作为一个对手，是根本不够格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过于分散，在地理上也过于遥远。中国的问题太多，它在今后可能造成的威胁也太遥远。

然而，由于美国国内存在着强调差异、多样性和多文化的种种力量，存在着民族和种族的分裂，它也许比大多数国家更需要以反对别人来维持它的团结。两千多年前，在公元前 84 年，在罗马人消灭了米特拉达梯六世的军队、完全征服了已知世界之后，苏拉问到：“现在世上已没有了我们要打的敌人，共和国的命运将如何？”这个问题很快就有了答案：几年之后，这个共和国便崩离析。等待美国的不大可能是同样命运，然而，美国信念还会有多大吸引力？还能得到多少支持？在没有对立的思想的情况下它是否还会生气勃勃。历史的终结、民主在全球的胜利——如果成为现实——可能会成为最令美国痛苦和不安的事。

### 思想的多样化

美国社会两种趋势的相互作用加剧了冷战结束所带来的起分裂作用的影响，这两个趋势就是移民的范围和来源的变化，以及多文化影响的增强。

过去对吸收移民所抱的忧虑已被证明毫无根据。直到前不久，移民们来美国还是因为他们认为移居美国是一个成为美国人的机会。然而，现在人们来美国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个保持其原有身份的机会？过去，移民们如果被拒于主流社会之外就会感受到歧视。现在的情况似乎是，有些移民群体，如果不允许他们置身于主流之外，他们反会感到受歧视。

多文化和多样性的思想加强了这些趋势，并使它们合法化。它们否认美国有一种共同文化的存在，谴责同化，突出种族、民族和其他国家文化和群体的地位。它们还对美国信念中的一个基本要素提出异议，要以主要根据种族、民族、性别和性偏向界定的群体的权利取代个人的权利。

如果美国真的变成了多种文化并存，美国的特性和统一将取决于政治思想的不断统一。美国人本来把他们为自由平等之类的普遍的价值观念进行的奋斗视为国家利益的一个重要根源。这种思想已经变成了“巩固这个伟大而独特的国家结构的纽带”。然而，如果没有一种共同文化来支撑，这些原则不过是国家统一的脆弱的基础。正如认知不一致论认为的那样，人们可以根据改变了的外部环境较快地改变他们的思想和信仰。在整个前共产党世界，上层人士已经转而标榜自己为忠实的民主派、自由市场的支持者、或热情的民族主义者。

对大多数国家而言，思想体系同国家特性没有什么关系。中国曾经历了许多朝代的更迭，在共产主义崩溃之后还将继续生存发展。没有共产主义，中国还仍将是中国。英国、法国、日本和德国在各自的历史上也曾有过各种占支配地位的思想体系。但是，如果美国的政治思想归于终结，



它是否还能继续生存下去？苏联的命运是使美国人清醒的一面镜子。美国与苏联大不相同，但是，从传统的角度说，它们都不是一个民族国家，就此而言，它们又彼此相似。在很大程度上，这两个国家都是以思想体系给自己定位的，而苏联的例子证明，作为统一的基础，意识形态这种基础可能要比深深扎根于历史的民族文化的基础脆弱得多。如果多文化盛行，如果对开明的民主制度的共识发生分歧，那么，美国就可能同苏联一道落进历史的垃圾堆。

### 寻求国家利益

国家利益是对所有或大多数美国人都很重要的公共利益。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是他们愿以鲜血和珍贵之物予以捍卫的利益。通常，国家利益既包含安全与物质方面的关注，又包含道义与道德方面的关注。对萨达姆采取的军事行动被视为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因为他威胁了获得波斯湾石油的可靠而又省钱的途径，同时也因为他是一个悍然入侵并兼并了另一个国家的贪婪的独裁者。现在所需要的不是寻找能为美国利益服务的力量，而是寻找能将美国的力量派上用场的目的。

这种需要导致美国对外政策机构急切的寻求使美国有理由在世界事务中继续发挥冷战时期所发挥的那种作用的新目的。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确定了以下五项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防止有人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对美国发动袭击；防止在欧洲或亚洲出现敌对的霸权国家；防止在美国边界上出现敌对的力量或出现握有海上控制权的力量；防止全球贸易、金融市场、能源供应和环境体系发生崩溃；确保美国盟国的生存。

然而，这些利益受到那些威胁呢？针对美国的核恐怖可能是一个近期的威胁；中国作为一个东亚霸主的崛起可能是一个较长时期的威胁。除了这两个威胁以外，很难看出国家利益委员会所确定的至关重要的利益受到任何隐约可见的重要挑战。新的威胁毫无疑问会出现，但是，鉴于眼下并没有威胁，人们便对那些旨在引起国人对外交事务的兴趣、唤起国人对重要的对外政策主动行动的支持的各种宣传就置若罔闻。政府呼吁“扩大”民主，却得不到公众的响应，而且政府自己的行动就暴露出它的呼吁是言不由衷的。新保守主义这鼓吹大幅度增加防务开支的论点像冷战时期主张销毁核武器的论点一样显得不现实。

人们常常论证说，要解决世界性问题，就需要美国来“领导”。情形往往确实如此。然而，要求实行领导的呼吁回避了“领导做什么”这个问题，而且它所依据的假定是：世界的问题也就是美国的问题。可实际情况往往不是这样。世界许多地方存在弊端，这是一个不幸的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或者有兴趣或有责任来匡正这些弊端。国家利益委员会说，要就国家利益问题达成共识，就需要总统来领导。然而，现在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有了这样一种共识：从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美国没有理由过问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大多数问题。对外政策机构在要求总统为一项根本不会被接受的事业提出理由。这种寻求国家利益的努力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它没能产生能够获得哪怕是一丁点儿广泛支持的、人民愿意为之投入较多力量的那种目的。

### 商业主义与民族意识

缺乏得到普遍支持的国家利益并不意味着美国将回到孤立主义状态。美国依然参与国际事务，但是它现在的参与不是着眼于国家利益，而是着眼于商业和民族的利益。美国目前在世界上的作用可以用经济与民族方面的排他主义来界定。冷战时期为宏伟的国家目标服务的体制和能力——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和情报方面的体制和能力——现在转而被用来为狭隘的次国家的、超国家的甚至是非国家的目的服务了。现在越来越多地听到人们论证说，对外政策正是应当



为这些利益服务。

克林顿政府一直重视“商业外交”，把促进美国出口定为美国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它在为美国产品谋求外国市场准入方面也确实取得了成功。商业成绩也成为对美国大使工作情况的首要考核标准。克林顿总统花在促进美国产品在国外销售上的时间很可能比他在对外政策方面的任何其他问题上花的时间都多。如果真是这样，这将是美国对外政策转变方向的一个引人注目的迹象。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内，在一件又一件事情上，商业主义的需要都超越了其他目的，其中包括人权、民主、联盟关系、保持均势、技术出口管制以及一位政府官员称之为“空洞的废话”的任何其他战略的政治的考虑。

克林顿政府商务部的一位前高级官员争辩说：“政府、国会和更广泛的对外政策界的许多人士仍然认为商业政策是外交政策的工具，而现在的情况往往是刚好相反——美国应当利用他所有的外交政策手段来实现商业目标”。用于促进商业目标的资金应当大大增加，为实现这种目标而工作的人员的素质应当提高并且应当接受专业训练，与促进出口有关的部门需要加强和改组。在对外政策中，这个游戏的名称叫：赢得合同。

至少这是其中一种游戏的名称。另一种游戏是促进民族利益。经济利益通常是次国家的，民族利益一般来说则是超国家的或非国家的。对特定企业或行业的促进也许不象一般性的减少贸易壁垒那样关系到普遍的公众利益，但它的确能促进某些美国人的利益。民族集团则促进美国以外的人民和实体的利益。

各民族集团在决定美国对外政策方面所起的越来越大的作用由于新近的移民浪潮和有人提出的多样化及多文化主义的论点而得到加强。此外，更加丰富多样的民族群体及通信和交通手段的引人注目的改善使得各族裔移民与其原籍国之间保持联系变的容易得多了。结果，这些集团正在由一国疆界之内的文化群体变为超越这种疆界的移民社群。以国家为基础的移民社群，即至少控制着一个国家的跨国文化群体，变的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维护他们原籍国的利益了。著名专家加布里埃尔·谢费尔在《生存》杂志上撰文说：“（移民）完全被他们所移居的社会同化这种做法不论在地位已经牢固的移民社群中还是在刚刚形成的移民社群中都已变得过时了——许多移民群体或者没有遇到迫使他们同化的巨大压力，或者没有感受到被移居国社会同化、甚至是取得移居国的国籍有任何明显的好处。”由于美国是世界上移民最多的国家，这种由同化转向多样性、由民族集团转向移民社群的趋势对他的影响也最大。

最重要的是，移民社群能对移居国的行动和政策施加影响，利用他的资源和影响去为他们的原籍国的利益服务。近几年来，在美国对希腊和土耳其的政策、在高加索问题上、在承认马其顿、支持克罗地亚、制裁南非、援助黑非洲、干预海地局势、北约东扩、制裁古巴、北爱尔兰地争论以及以色列同期邻国关系等问题上，移民发挥了重要影响。总之，正如（前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1997年在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演讲时所说的，美国现在“与其说有一项传统大国意义上的对外政策，不如说只是把国内选民集团提出的一系列目标拼凑在一起——其结果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前后不一。这不象世界首屈一指的国家所应有的做法。”

国家利益被商业和民族利益所取代，这反映了对外政策的对内化。国内政治和国内利益向来对对外政策有影响，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恰当的。然而，以前那种认为对外和对内政策的制定过程由于一些重要的原因而有所不同的假定已经站不住脚了。

为理解美国的对外政策所必须研究的不是美国在一个各国相互竞争的世界上的国家利益，而是需要研究经济与民族利益在国内政治中的影响。至少在最近几年，后者成了预测美国对外政



策立场的最佳依据。从为促进作为一个集体的美国相对于类似集体而言的利益而有意识设计的行动这一意义上说，对外政策正缓慢地、但却是稳步地消失着。

### 美国力量的压力与引力

冷战结束10年之后，关于美国的力量还存在着一种看起来很荒谬的现象。一方面，美国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它的经济力量和繁荣程度都居世界之首。他的经济原则越来越得到世界各地的认同。他花在防务上面的钱比所有其他主要国家加在一起还要多，而且他有着唯一能在世界几乎每一个地区采取有效行动的军事力量。他在技术方面遥遥领先于任何其他国家，而且看来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肯定能保住这种领先地位。美国的流行文化和消费品席卷全世界，渗透到最边远和最抗拒的社会。简言之，美国在经济、意识形态、军事、技术和文化方面居于压倒优势。

另一方面，美国的影响却远远没有那么大。不论是小国还是大国，穷国还是富国，友邦还是敌国，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国家，看来所有国家都能抵制美国决策人的诱惑和威胁。在贸易保护主义、制裁、干涉、人权、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维持和平和其他问题上，外国政府的官员彬彬有礼的倾听美国的要求和恳求，或许还泛泛的表示同意他的主张，但过后还是不声不响的我行我素。1994年，小小的新加坡无视美国施加的极大压力，依旧对美国少年施用了笞刑。经济崩溃、陷于孤立的古巴成功的改变了美国的移民政策。美国请求波兰别与伊朗缔结武器协定，波兰根本不予理睬。美国压约旦中断同伊拉克的商业往来，约旦一直抵制。……中国则断然拒绝美国就人权问题提出的要求。美国对中国和日本的贸易政策方面无法实现他的目标，无法劝说俄罗斯不向中国和伊朗转让武器和技术，无法除掉萨达姆、卡斯特罗、卡扎非，无法压制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彼此迁就，无法说服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在波斯尼亚实行有意义的合作，无法使日本实行重大的经济改革。美国显然仍就能对任何重要的国际行动行使否决权，但是他劝诱其他国家以他认为它们应当遵循的行事方式、行动的能力与它的“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形象是不大相称的。

美国力量的强大与美国影响的乏力这两者之间的明显差距应当如何解释呢？这种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是拿一个国家的国力与它的政府的强弱相比较的结果。美国历来是一个国力强大而政府软弱的国家。除了军事力量之外，被当作美国力量强大的证据的大多数资源是美国政府所不易控制的。尽管它的经济居世界第一位，但它的联邦政府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1993年为19.7%）却比收入最高的24个国家中除两个（日本和瑞士）以外的所有国家都小。

关于力量与影响之间的差距的另一个与此相关的解释来自美国力量性质的不断变化。美国现在是、以后仍将是一个全球霸主。然而这种支配作用的性质正在改变，就像其他霸权国家所起的作用的性质已有改变一样。各霸权国家的影响在初期是来自它们化钱的能力。它们向别国部署军事力量、搞经济投资、提供贷款、行贿、派遣外交官和官员，并常常把那些国家的领土和人民置于自己的直接和间接控制之下。在建立霸权后的第二阶段，化钱的能力便被吸引力所取代。到70年代，美国的霸权就开始进入这个阶段了。此时，霸权第一阶段的向外扩张就让位于第二阶段向内吸引的特点了。到了90年代，美国仍在出口食品、技术、思想、文化和军事力量。然而，它却在进口人员、资本和商品。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一般来说，它吸纳的移民比世界所有其他国家加在一起还要多。不论是种田的农民还是诺贝尔奖得主，都想移居美国。世界各地的上层人士都想把孩子送到美国的大学去读书。最重要的是，各国公司都想进入美国的市场。

吸引力取决于外国人是否觉得把钱、商品和孩子送到美国去是符合他们利益的。然而，这



仍是一种力量，而且是第二阶段霸权国家典型的力量形式。

美国在成为霸权国家的第一阶段，每年要化数十亿美元去设法影响外国政策——或许只有苏联除外——的决策、选举和政局，这肯定超过了外国政府为影响美国竞选所花费的财力总和。现在，这种情况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并且已经完全颠倒过来了。美国所采取的旨在影响外国政府的活动要么停止了，要么大大减少了。对外援助削减了，而且只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它也很少进行隐蔽的干预了，为试图影响国外的选举及其他结果所化的钱仅为以前的一小部分。相比之下，外国机构旨在影响美国决策的努力却大大增加了。因此，美国现在与其说充当演员不如说已经变成舞台了。

外国政府和公司现在花费巨额资金在美国搞公共关系和进行游说。例如，据报道日本每年在这方面花的钱达1.5亿美元。

美国的对外政策正在成为一种越来越致力于在国外促进十分具体的商业和民族利益的排他性对外政策。在冷战期间用来为国家利益服务的那些机制、资源和影响正转而为这些利益服务。克林顿政府埋头于本国政治，这也许使上述做法受到了促进，但是这样做的根本原因还在于美国的内外环境发生了更广泛的变化以及对美国国家特性的认识正在发生变化。

内外环境方面的这些因素在近期内是极小可能改变的。可以想见，中国会成为一个新的敌人。中国的一些重要集团当然是把美国视为他们的新敌人的。然而，眼下中国还不会成为足以唤起美国人新的国家特性和目的感的那样一种威胁，而且对这种威胁的严重性的判断将取决于美国人如何看待中国在东亚的霸权地位给美国利益造成的损害。要想重新唤起较强的国家特性感还需要战胜美国存在的崇尚多样性及多文化主义的思想。大概需要按照乔丹委员会建议的原则限制移民的进入，并制定公营和私营部门的美国化计划，以对抗那些促使移民社群效忠于原籍国的因素，促进移民的同化。这些事情都很可能发生，但是，考虑到“我们大家现在都成了多文化主义者（内森·格莱泽语），最近出现的这种非国家趋势不是短期内可以扭转的。

要消除对外政策中的单一目标倾向，美国公众就得致力于寻求新的国家利益。这种国家利益将超越商业及民族利益并使之处于从属地位。民意测验显示，目前多数美国公众对拿出大量财力捍卫美国的盟国、保护小国抵御侵略、促进人权和民主或者帮助第三世界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做法给予支持。其结果，政府官员对这些或其他广泛目标的阐述得不到多少响应；除极少例外情况之外，权势集团人士要求美国实行领导的呼吁也没有产生有效的行动。美国对外政策既然不能兑现他的广泛承诺，也就变成了空谈与退却的政策，政府则积极致力于促进它所专注的事情。外国政府也学会不认真对待美国政府的一般性政策声明，而是十分认真的对待它一心追逐商业和民族利益的行动。

因此，取代单一目标政策的办法不是公布一项“宏伟计划“前后一致的战略”或“对外政策构想”，而是制定一项克制与改组的政策，其目标是对抽调美国国力为排他性的次国家、跨国家和非国家利益服务加以限制。国家的利益在于国家实行克制，看来这是现阶段美国人民愿意给予支持的唯一的国家利益。因此，对外政策精英们最好把精力用在制定一些减少美国对世界事务的卷入，以保障可能出现的未来国家利益上，而不是制定在国外采取重大行动的不现实的计划。

到将来的某个时候，安全方面的威胁和道义方面的挑战要求美国人再度投入很大的力量来捍卫国家利益。经验证明，从低水平的基础上动员这种力量很可能比把一直用来为既定的单一目标服务的力量转到这方面要容易一些。现在发挥一种比较克制的作用可能有利于美国将来在需要唤起国家特性感来追寻美国人民愿以生命、财富和国家荣誉感去实现的那种国家目标时发挥更积

